

第一章

我的中国漫步

本章是将自2000年1月至2002年春发表于地方刊物《博多独乐》上的22篇连载文章补充修订后写成的。

从“万里长城” 看到的中国的未来

一次，中国朋友教给我这样一句话：

“造原子弹的 不如卖鸡蛋的”。

就是说，与其吃苦费劲当科学家，不如做生意赚钱。这句流行语辛辣地反映出中国一些年轻人的拜金主义达到了何种程度。

近一时期，我因本部设在福州市内的公司的工作关系，前往“万里长城”的次数增多了。在那里，我遇到了与当今日本媒体报道的内容大相径庭、充满希望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

万里长城全长约 6000 多公里，其中，世界上最著名的是“八达岭”长城。管理八达岭的，是北京市下属 8 县之一的延庆县。

该县据说在 8 个县中最为贫穷，人口约 27 万，没有值得一提的产业。不过，该地区却拥有以八达岭长城为首的未开发的自然旅游资源。

（嘘 小声点 有件事我可只想告诉各位读者哟——延庆县里有尚未向外国游客开放、可以认为是沙漠中的绿洲的非常神秘的旅游热点。那里很快就要开放了）

管理八达岭的部门的领导是一位名叫乔雨的 33 岁年轻人，据说在他手下工作的员工大约有 3000 名。他总是一副翻领衬衫打扮，性格稳健，决不会大声说话。从他稳稳立于大地之上的双腿和可以透视未来的敏锐的目光中，能够看出中国年轻一代领导人的实力。

一次，我问带我参观延庆县市容的乔雨：“这里走高速到北京只需 40 分钟，交通非常便利。要是吸引外国企业的话，就能建成许多工厂，带来经济发展吧？”

他一听马上说到：“我们县最值得自豪的，是这里是全北京空气最清新的地方。所以，污染空气的工厂我们是不会建的。现在，我们在花大气力完善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我们的目标，是利用自然生态，建设重视百姓文化生活的美丽旅游城市。”他果断的回答像是对我的话有力的反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为自己的失言后悔不已。以后，每当我去长城时，都有一种被说成是最贫瘠的延庆县实际上是非常富裕的地方的感觉，甚至是看到了中国未来充满希望的身影的感觉。

（发表于 2000 年 1 月刊）

从“万里长城”

思考如何与中国做生意

您知道在巍峨耸立的“万里长城”的八达岭入口处的一角，与长城博物馆并排，有一座长城全周影院吗？

实际上，全周影院是一家中日合资设立的公司，它通过360度的圆型银幕展示了全长6000多公里的长城四季的雄姿。上映时间约为15分钟，带有包括中日英文在内的6种语言解说，壮观的画面将观众一下带回到两千年前的世界中。

该全周影院由管理长城的北京市八达岭旅游总公司（总经理乔雨）出资45%、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分公司中信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李克民）出资10%、福冈市福巴株式会社（社长庄岛厚生）的分公司福冈经济贸易株式会社出资45%，以中日文化交流和帮助长城旅游事业发展为主要目的，于1988年签订合资协议（协议期15年），1990年9月开业的。

正是由于这些，据说开业时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济济一堂，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按照合资协议，最初的5年里，将对现金出资公司优先进行偿还。如果按这样计算，最初的5年内收回投入的全部资金，剩下的10年便可坐等分红了。

然而这座全周影院从3年起开始出现赤字，运营陷入困境。于是，中国合资方八达岭旅游总公司认为造成这一局面

的责任在日方。而日方担心 15 年协议期满后所有的一切将转交给中方，他们以延长协议期为先决条件，开始同八达岭旅游总公司进行延期谈判。同时，他们还向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协助偿还投入资金的要求。我也从那时起，作为翻译参与了这一过程。

但日方长达 2 年的交涉未能取得如期的进展，并陷入了僵局。“好吧，要是直接不行，下面，就只有借用北京市政府所有的一切政治力量，以及日本的政治力量了……或者，就把持有的股份全卖掉……”日方的合资公司只剩下焦虑不安了。但结果就像是粘上了“牛皮糖”一样毫无进展。日子在茫然不知所措之中一天天过去了。

但某一天，日方合资公司意识到，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于是，转而从头开始重树中日双方的信赖关系。

自打那以后，老板再去北京时，不再住在北京市内，而是住在长城所在的延庆县。他们通过与合作伙伴同吃同住，努力构筑着合作关系。

结果，一直僵持着的关系得到改善，1999 年 4 月，董事会终于在福冈市召开了。进而同年 10 月，应延庆县政府邀请，以福冈银行常务监察右田幸雄为团长的福冈北京延庆县经济考察团一行 16 人访问了北京市和延庆县，就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和中日合资中的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这些年，许多在中国投资的日本和韩国企业因经营陷入困境而不得不退出中国。说到退出的原因，一般都会提到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实施的金融紧缩政

策。此外，也许还有日本企业的体制虚弱和优柔寡断等。

诚然，这些原因不能否定。但通过全周影院一事，我认识到在此之前的问题的重要性。我痛切感到，无论哪个国家，做生意的都是人，没有树立相互间信赖关系的地方，是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

我祝愿通过新的伙伴关系的构筑，万里长城的这一合作项目能够取得成功，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成为今后对华投资的牵引力。

今天，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操劳的朋友们，以及今后想要和中国做生意的朋友们，在考虑生意经之前，我劝你们学习一下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文化习俗和国民心理。进而，要是掌握汉语的简单日常会话，就会成为“心的交流”的巨大力量。

（发表于 2000 年 2 月刊）

2000 年后的

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去年年关迫近的 12 月 13 日至 14 日，以李瑞环阁下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 70 余人访问了福冈。为了欢迎自 1994 年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现在的总理）访问福冈以来的首位中国贵宾来访，以福冈县知事为首的当地各界人士齐聚一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作为主翻，我也荣幸地担任了李瑞环阁下与麻生渡知事之间的翻译。

晚宴上李瑞环阁下与麻生知事交谈的话题，集中在“当今中日之间的年轻一代所处的现状”和“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及对策”上。对于麻生知事尖锐的提问，李瑞环阁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知事，以平缓的语调非常坦率而认真地回答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十一世纪被称为是亚太地区的时代，但我却坚持认为，这是中国主宰世界的时代。我强烈地预感，就像远在 2000 年前的古代中国在上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那样，现在，中国重新发挥这样作用的时代或许就要到来。

日本是在迷惘状态之中迎接着二十一世纪的。与之相比，尽管中国当前存在各种社会问题，受到西方舆论的严厉攻击，但她以“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伟大

而明确的事业为目标，正在高歌猛进。为了实现目标，她花费巨大的国力，长远而又富战略性地鼓励培养新一代的接班人。

一次，我曾经问过中国政府的一位领导人：“你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很难理解。所谓市场经济，不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吗？”

那位领导人马上这么回答我说：

“不是。中国希望实现的市场经济不能说等于资本主义经济。时至今日，中国经历了 3000 年漫长的封建社会，走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其中尽管有反复和曲折，但我们目睹了国际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归根到一点，可能听起来不大容易理解，我们希望实现的，是一种只提取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精华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理想的崭新社会。”对此我说道：“到目前为止，我在日本、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生活过，还多次访问过亚洲各国和欧洲的主要国家。我觉得，英国和德国社会非常成熟，具有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富裕……”没等我说完，那位领导接话说：“对呀，我们所要实现的，就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都发达的新型中国社会呀！”对我的话作了一个总结。

确实，8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能够亲身感受的成绩，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但是，如果解决不好 12 亿国民的温饱这个大问题，赶超日本就是一句空话。这样说并不过分。不过，听说今天中国取得与标准的日本人同等收入水平的国民至少有 5% 即 6000 万人。不能忘记的是，6000

万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人口的将近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国际经济社会的现状当中，中国经济现在尽管紧咬牙关，却保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能力。就在不久前，传来了中国加入 WTO 已成定局的消息，似乎是对此最好的证明。可以说世界已公认，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已具备了在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基础上谋求发展的能力和环境。

还是让我们把话题回到晚宴上。席间 麻生知事说道：“正是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 拥有文学素养非常重要。文学能够给人以裨益和力量。现在中国的文学情况怎么样？……不过，瑞环真是个好名字呀！”

对此，李瑞环阁下是这样回答的：“在中国，‘瑞’这个字意思非常好。我们有句话叫‘瑞雪兆丰年’，就是说，严冬好雪，其年收成愈丰。”

今天的中日两国，并非处于那严冬最寒冷的时期。衷心希望二十一世纪中日两国能走得更近，像“瑞雪兆丰年”说的那样，迎来共同丰收的时代。

（发表于 2000 年 3 月刊）

南京的樱花

——今年已是第五春

上个星期天，和往常一样，我带着孩子前去丈夫的父母家（福冈市南区长住）途中，路过矗立在桧原小池边的10棵樱花大树旁时，不知是谁说了声：“停一下车吧”。于是，我们决定下车到树边看看。

许久未见的樱花老树还是绿叶葱葱，被暖风一吹，幸福地摇曳着。实际上，这10颗樱花树16年前因桧原地区道路扩建曾被列为砍伐的对象。

但是，一些市民想到樱花树被砍之后的凄凉，他们创作了希望不要砍伐樱花树的短歌，挂在每一颗树上。听说当时的进藤一马市长被这些短歌强烈震撼，立即回歌赋道：“惺惺惜樱花，大和心清明。从此永不闻，款款花之心”。于是10颗樱花树免遭被砍之命，得以保存。

在移植的樱花树旁，立有刻着进藤市长短歌的石碑。看着石碑上的短歌，我不禁想起了5年前福冈县民在南京种下的那3000棵樱花树……

7年前接近年关的12月的一天，福冈县议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为中国总领事吴治安先生举办了交流宴会。那天，我作为翻译也出席了。

宴会开始后不久才赶到的新宫松比古议员在交谈中直率地向总领事提出：“我们能不能在和福冈缔结友好关系的江苏省省会南京市的中山陵旁边种植樱花树？”或许是因为事出突然，或许是因为南京这块土地的特殊关系，总领事一下找不出合适的回答方式，只是不解地说了声：“这是件好事嘛！”

新宫议员察觉出其中的原委，马上详细介绍起了进藤一马先生与孙文先生之间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孙文先生几次流亡日本。其中，他也几次到过福冈。他的革命活动受到九州地区很多友人庇护和支持。当时，位于福冈市内的玄洋社的进藤喜平先生（进藤前市长的父亲）便是庇护孙文先生的友人之一。所以，听说进藤前市长从小时候起便非常崇拜孙文先生。

“进藤前市长生前经常表示，希望到孙文先生长眠的南京中山陵去看看。然而，这一愿望还未及实现他便过世了。所以，我们哪怕是在孙文先生长眠的中山陵为进藤前市长种上他钟爱有加的樱花树也好呀！”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一年开始了。新宫先生担任了县会议长。

那年秋天，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凌启鸿先生一行访问福冈县时，新宫议长向凌先生表明了这一心愿。

“在中山陵这座国家公园里种植日本的樱花树，可能很困难。不过，我们已经非常明白新宫先生的心情。回国后，我们将全力做中央政府的工作。同时，也欢迎先生于近期访问南

京。”凌先生回南京前留下了这样的话。

一个月后，以新宫议长为团长的县议会友好访华团访问了南京，正式决定作为福冈县议会与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共同事业，在中山陵国家公园中建设“福冈——江苏樱花友谊林”。

回国后，新宫议长希望将对进藤前市长的思念化为县民日中友好运动的动力。他与早已表示支持这一想法的北原守议员和松永成行议员密切合作，很快发起成立了樱花友谊林建设实施委员会（我也是委员之一），并说服了福冈银行前专务杉浦博夫担任会长，广泛开展了募捐活动。

其后，委员会收到了包括县议会全体议员在内的约 2000 名人士的捐款，并得到了福冈县和福冈市的协助。第二年，也就是 1996 年 2 月，“福冈——江苏樱花友谊林”落成了。

3000 棵樱花树种植在长满中国人最喜爱的梅花树的梅花山旁。如今，这些樱花树感受着中国人民广阔的胸襟和温暖的情谊，同时怀着对福冈县民报答之情，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已经迎来了第 5 个年头。

在 3000 株樱花的花丛中，矗立着进藤先生的诗碑：樱花啊樱花，在你的国度里我们生长，在你的怒放中，我们又逢春天。进藤先生与孙文先生一定会在天国里静静地祝愿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吧。

（发表于 2000 年 4 月刊）

中国的老人们， 你们还好吗？

一天下午，我和两个女儿带着另一位家庭成员阿玲（博美狗）到树木吐翠鲜花怒放的附近公园散步。本来，绕公园周后回家是定下来的散步路线。可那天天气很好，女儿们绕着公园一跑就不想回去了。于是，我也决定在公园的椅子上坐下，一边注视远处欢蹦乱跳的女儿们，一边欣赏树绿花香。

受女儿们的欢声笑语和春天令人有些倦怠的暖意的感染，我在椅子上度过了一小会儿幸福的时光。蓦然清醒时，我发觉公园中没有其他孩子嬉戏的身影。能够看到的，只是几个默默无语、行色匆匆的过路人。

我们换个话题。几年前，我曾担任过电视节目字幕的翻译工作。NHK（日本广播协会）每周星期天早上都要播放名为《发现新亚洲》的节目。这些节目是由各个NHK分局直接前往亚洲各国采访后制作的记录片。其中，包括很多从不同视角报道中国的内容。

最近的节目中，播出了中国天津苦心经营养老院的国营企业下岗中年夫妇，以及在那里安度晚年的老人们的镜头。节目说的是主人公从国营企业下岗后，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退職金为资本，租借旧公寓创办养老院的故事。

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等待他们的 是经营陷入苦恼。政府的补助没有指望，银行的贷款很难得到，激烈的同行竞争使他们无法提高入院费，却又必须保证不差于别人的服务。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如何生存下去，每天下班后直到深夜，夫妇俩都在不停地商量。无论怎么难，夫妇俩总是说“像我们这样有活干，家人又没有流落街头，能这么活着我们已经很知足了”。他们脸上永远带着笑容，对老人们的照顾体贴入微，以相互间的智慧彼此依靠，共度难关的身影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

今天的日本，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老龄对策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临近的中国也不能例外。现在，中国的老龄化率（60岁以上的人口率）有的地区已达 15%。加之 20 年前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说中国老龄化的步伐将不可避免地加快。

“四世同堂”说的是儿女照料年迈的双亲，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今天中国的现状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与父母同居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就算有少数的同居家庭，由于几乎所有的夫妇均为双职工，因此即便他们的父母因病需要照料，事实上他们根本也无能为力。

为迎合这样的社会需求，最近在中国国营企业的下岗人员中，多少掀起了一股兴办养老院的热潮。老人们在这些条件并不完善的养老院中接受贴身服务，期待着与不时前来探望的家人相见，每天过得既满足又安宁。

令我不解的是，现在中国的发展虽日新月异，但这些老人们的生活决说不上富裕。可现实即使如此，他们的脸上为什么总带着幸福而安详的表情呢？一次，我就此事询问了一位中国朋友。

她是这样解释的：“现在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先是经历了可怕的战争，接着又遭受反复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折磨，他们的命太苦了。所以，就算今天的日子有些不方便，他们也会为今日所获得的自由唱赞歌的”。

这里，让我们把话题回到公园。读者朋友，难道你们不认为，与外国人相比，我们日本人日常生活中与公园的关系是不是太疏远了？你们是不是认为，公园只是孩子们游乐的场所？平常很少能看到在公园中悠闲地读着书，或是享受着日光浴的人。注意到这一现象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中国的公园每天一早起，就能看到很多缓缓舞动身躯打着太极拳，或是边聊天边打着麻将，或是兴致勃勃跳着迪斯科或交谊舞的老人。到了黄昏和节假日，这里又因为三五成群看书学习的年轻人、切切私语的恋人们、以及在一旁幸福地注视着孩子们玩耍的父母们的到来而更加热闹了。

（发表于 2000 年 5 月刊）

面向中日 两国的未来

二十一世纪一天天临近，甚至可以听到她“沙沙”的脚步声了。

但我所关心的是，作为二十以世纪的迎接者，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今天的人们希望迎来一个怎样的二十一世纪，尤其是中国与日本，应该怎样相待相处。

国际化与国际交流这样的字眼在日本的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上频繁出现，一晃也快 30 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战后中日交流的岁月。

28年前的 1972 年，中日两国间断绝的邦交通过当时的田中角荣首相（今天已故）和拥有卓越外交才干的中国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之手得以正常化，中日两国迎来了坚冰溶化的季节。记得看了记录当时场景的影片后，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我深受感动，下定决心将来成为一名翻译，为中日间的交流牵线搭桥。

到了不久之后的 70 年代中期，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福冈县，1979 年北九州市与大连市、福冈市与广州市之间分别缔结为友好城市。福冈县也于 1985 年设立了国际交流课，并于 1992 年与中国江苏省正式成为友好

省县。

现在，中国与各国间共有超过 900 对的友好城市，其中与日本有 203 对，最早的是 1973 年结好的神户与天津。可以说，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友好城市交流主要是在 1978 年以后。

回首近 30 年的中日两国间新的交流的轨迹，这种交流已从增进相互了解的政府间干杯交流型，转变为以相互发展为目的的经济技术交流型。然而，长期交流中作为在第一线起着沟通双方作用的翻译，我始终抱有一丝忧虑：今天的中日两国之间，果真培育出真正的友好关系了吗？

我强烈地感到，今天中日两国之间的现实却是，对过去并没有认真地清算，对未来也没有细心地描绘。

对此，平素爱好装裱的山田伊佐久大师（79 岁，现住粕屋郡）经常鼓励我说：“青木，这是没办法的。我们这代人，身背‘历史’这个重负，头脑中装的其他东西太多了。日本和中国的未来，只有靠今后两国的年轻人了。不过，重要的是两国的年轻人要为此做到彼此之间相互正确理解。所以我一直在给中国的年轻人寄书。你现在不是在大学教年轻人学习汉语吗？好好教育他们吧！”

事实上，从 20 多年前开始，经已故的福冈县议会小西平太郎议员介绍，山田先生通过装裱开始与中国的书法家和文化人士交流。后来，他在福冈县中日友好青年之船（今称‘青年之翼’）的帮助下，一直坚持向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日语系学生寄送有助于他们日语学习的读物，迄今为止已超过 1 万